

# 北京鋼院

本期四版 內部刊物 注意保存

1957.6.25.

87

星期二

地址：北京北郊 電話(27)441轉

1955年2月11日創刊

北京鋼鐵工業學院院刊編輯室

## 我院師生員工舉行大會

### 討論目前階級斗争形勢，抨擊右派言論

六月二十二日下午，工会和学生会联合举行大会，專題討論目前階級斗争形勢，抨擊右派言論。二十四日上午，繼續召開大會進行討論。會上，先後有煉鐵教研組陶少傑、教務長魏壽昆、俄文教研組乔丕成、矿57.3班同學宋漢倫、采礦教研組劉之祥、煉鋼教研組石心圃、采礦教研組郭楠、院長辦公室朱明德、伙食科炊事員趙壁等共十八位發言。

在大家的發言中都認為目前的形勢是右派與反右派兩條路線的斗争，這是反映着中國要走資本主義道路或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一場嚴重的斗争。高誥善說，如果讓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全國人民就將陷入被奴役的地位，這是千百萬人要掉腦袋的事情，全國人民堅決不能答應！“毫無疑問，我們要走社會主義的道路！我們痛恨資本主義！我們深信共產主義在中國必然取得偉大的勝利，在黨的領導下，我們要更加堅定的團結起來，堅決站穩工人階級立場，劃清敵我思想界限，誓與右派分子鬥爭到底，不獲全勝，決不罷休。”——這是大家在發言中一致的強有力的結論。

魏壽昆代表鋼院九三學社發言，他對儲安平之流以九三學社作為政治資本，進行奪取共產黨領導權的陰謀活動表示十分憤慨。他建議九三學社中央立即撤消他們一切社內職務並對他們進行嚴格的處理。

乔丕成代表民盟鋼院支部全體成員在會上發言並宣讀了他們在六月十九日支部大會上的

決議（見院刊86期）。

石心圃代表民革鋼院支部所有成員在會上發言。他說我們要用毛主席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針來武裝我們的思想，明辨是非，堅決與右派分子的謠言作无情的回擊和鬥爭！

郭楠以民建會員身份發言。他痛斥章乃器所謂資產階級沒有兩面性的右派言論。他說象這樣的右派分子必須打倒他，否則，擾亂視聽，對我們黨和建設有很大妨礙和影響。

院長辦公室朱明德在發言中說，鋼院有沒有右派分子，大家可以討論；右派言論肯定是有。接着炊事員趙壁說：鋼院是不是有右派分子呢？我們要提高警惕，擦亮眼睛。

矿57.3班學生宋漢倫在發言中以親身體會的事實駁斥葛佩琦所謂“統購統銷搞糟了”和“農民生活下降了”的反共言論。他說：我是農民出身，家在河南襄陽縣。1946年冬鬧大水災時，農民沒啥吃，只得以樹皮……等充飢，最後出現了舅舅吃外甥的慘事。但解放後1955年也鬧了大水災，由於黨英明的領導和實行統購統銷的政策，大批糧食運至災區。結果一個人沒餓死。

劉之祥代表工會發言。他號召全體會員深入學習毛主席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報告，明辨是非標準，站穩立場，劃清思想界限。大家緊緊地團結起來，在黨的領導下，堅決粉碎一切右派言論，不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決不罷休！

動（如北醫謀殺事件的憤怒，和堅決駁斥右派思想，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等等），這難道不正說明了我們跟着黨走的決心嗎？這難道是黨群關係的“悽慘可悲”？！

在劉教授的心目中，共產黨是這樣的“漆黑一團”！這樣的“腐化”！劉教授還說他是曾經想申請入黨的，對於有“高度自尊心，可殺而不可辱”（見劉教授發言）的劉教授，竟然要參加如此“漆黑一團”，“腐化”的共產黨，實在令人費解！

#### (二) 劉教授的必然結論

既然共產黨無論在全國範圍內或在鋼院都是如此的“墮落”，那麼對於以“學校的工作崗位及安身立命之處”的劉教授，就必然得出如此的結論：把學校交給內行人（教授、講師、助教）來辦，反對黨委治校。

#### (三) 我們心目中的共產黨

當然，我們心目中的共產黨與劉教授心目中的截然不同！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政黨，它不僅代表著工人階級的利益，而且也代表著中國人民最根本最長遠的利益，它和人民群眾有著最密切的聯繫。它有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來不斷地求得進步。它和全國人民一道，不僅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上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而現在領導著全國人民走向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所以黨是光榮的偉大的，正確的！是不是共產黨內現在有80—70%的黨員不夠格了呢？事實的回答是：不！不是這樣的！劉少奇同志在八大政治報告中指出：“我們黨現在有一千零七十三萬黨員，絕大多數黨員都受了偉大的革命鬥爭的鍛鍊，就是60%以上的1949年以後入黨的黨員，基本上也都是過去幾年中，群眾革命鬥爭中和社會主義勞動中湧現出來的積極份子”。他們絕大多數政治方面是堅定的，對黨是忠誠的，在各個崗位上是為群眾所愛戴和擁護的。（當然也會有極少數條件不夠的混入黨內），讓我們看看：在與反革命分子進行殘酷鬥爭的時候，在抗美援朝的戰場上，在堅持農業合作化的鬥爭中，在工農生產，建設等各個戰線上，表現得最積極、勇敢，起了模範和帶頭作用的不正有許多都是共產黨員嗎！

黨是否在培養一批搖旗吶喊的“嘍囉”呢？

假如說，是培養一批為工人階級服務，為全中國人民服務，為建設社會主義服務的“嘍囉”。（應該說是為人民服務的勤務員）是的，黨是要培養這些人，因為他們是有馬克思

### 「尊師」與批判右派言論

王鋼

最近，當我院師生員工熱烈地投入反擊右派份子進攻的戰鬥和堅決與右派思想划清界限的時候，有少數同學提出了“尊師”問題，以反對同學們批判與分析我院教師中的右派言論，把“尊師”同“批判右派言論”相提並論或對立起來。我認為這種看法和提法是不對的。

首先必須肯定，“尊師”是新中國學生中必須樹立的共產主義道德風氣，是我們社會主義學校教育學生必備的品質，是共產主義教育的既定不變的內容。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它適用於任何地點和任何時間。正因為如此，談“尊師”就不能脫離社會主義立場，而必須以社會主義立場為前提。例如“尊長”也是我們所提倡的，但能否認為在“鎮反”與“肅反”時期揭發與檢舉反革命兄長的舉動就是不尊長？能否認為“三反”、“五反”運動中檢舉或批判資本家父兄的五毒行為和資產階級思想的作法就是不尊長？顯然是不能的。今天的情況也是一樣，我們處在一个嚴肅的政治與思想領域的階級鬥爭之中，因此必須站穩社會主義立場，來觀察和對待一切問題，這樣所謂“尊師”問題必將迎刃而解了。

其次，我們今天是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包括向右派份子反擊在內。如果同學們是按照“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來批判自己老師的錯誤思想和言論的話，這不但談不上不尊敬，相反地正是表示我們對他的愛戴。

### 中國人民永遠跟着共產黨走

伙食科 顧鳳鳴

解放前我是在鄉下，很小就作人家的童養媳，挨打、受罵、吃不飽、穿不暖，沒人把我當人看待，成天過着牛馬的生活。解放後，我翻了身，我開始學習文化，參加了勞動。現在不但成了一個工人，同時還能在業余學習文化。共產黨不但把我由牛馬生活中變成了人，而且使我學到了很多知識，懂得了很多東西。明產黨把我從黑暗的地獄里救出來並帶到光明的大道上來了，我感謝黨、熱愛黨，我把共產黨當成我再生的父母。要是有誰想推翻共產黨，想危害共產黨，我就和他拚命！因為我絕對不願意再重新過那牛馬的生活。

當我在報紙上看到葛佩琦說的：“群眾要推翻共產黨”，要殺“共產黨”的時候，我感到無比的氣憤！我要大聲的問：葛佩琦，你是替誰說話？你把反革命份子說成是人民、是老百姓，我是堅決不會答應的！因此我認為：我們堅決擊退反動言論和右派分子的進攻！保衛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保衛我們的幸福生活。

在我們鋼院裡還有少數人，他們夸大的領導有的同志還謾罵黨，要取消黨委領導；說什麼要“教授治校”，說什麼教授治黨也有飯吃，這是多麼荒唐的言論！我們黨委也有飯吃，我們全國人民战胜了反動派，又領導我們建了社會主義。解放几年來，黨領導我們人民作歷史從來沒有作過的偉大事業。你們這些謬的說法簡直對我們黨和全國人民是一種誣蔑！

請問：你們站在什麼立場？我堅決反對“取消黨委治校”的說法，最後我告訴你們：你們想錯了！中國人民是願意永遠跟着共產黨走的人，你們這些挑撥離間和陰謀鬼計的目的永遠達不到的！

代郵

- 二、 “為不平而鳴”仁同志；
  - 三、 “這是什麼假期”小兵同志；
  - 四、 “憶往事”千古同志；
  - 五、 “治校問題”野草同志；
  - 六、 “肅反估價問題”茂春同志；
- 請即示真實姓名和住址，以便聯繫，否則不予以刊登。

院刊編輯室

## 劉景芳在5月31日教授座談會上的發言原稿

編者按：院刊第68期曾發表了劉景芳在5月31日教授座談會上的發言，那是劉先生自己根據在會上發言的內容整理後交院刊發表的，在校對時劉先生對原稿又作了一些修改。最近，常有人來編輯室要68期院刊，查看劉先生的發言，同時昨日有很多大字報，要求院刊發表劉先生發言的原稿。故此，我們現在將劉先生的發言原稿發表出來。

### “主宗官”與肅反運動

為了進一步幫助某些同志在整風運動中很好地去檢查思想，今天我把到鋼院以來，前後亲自所聞所見的事情——某些同志的言行——當作線索，來再說一次我所要想說的話，並且試着從這些言行來看他們的思想本質。由於個人的馬列主義水平很低，而且是一些事情的“局內人”，很可能有許多看法和說法是主觀的、片面的；不過我想還是鳴放出來好，因為這些都是“推心置腹”之言，對同志來說是一種客觀的反映，或可作為同志們檢查思想時的參考資料。先從魏景昌副院長說起。

#### 一、鋼院的主宗官集團是由魏景昌同志為首的領導干部們形成的。

(1°) 魏景昌副院長和我初次見面時(52年10月中)便說：我們這兒不過教點初等微積分，頂高再教一點理論力學，而我們所重視的是各種專業。這些話使我當時立刻感覺：數學在鋼院是不重要的。自己並不知數學在科學的地位，却自以為是。結果數學教研組自成立以來，要啥沒啥，要求個資料室，三年多沒房子，沒人理。還是在你所捧的人物當系主任，把數學教研組划入該系，以便湊數，這位系主任給我組代要一間房子，然而要書陳列，又處處受到圖書館主任的推拖，到今天還不能開門。

(2°) 要我報告其他教授們的言行，作私人的“耳報神”，並且對於您這位首長，一個當教授的應當拋棄他的自尊心。您是否以為：我即是黨，黨即是我？這是您喜歡別人奉承的表現。

(3°) 借過年(54年)之便，召開茶話會，而要大家向領導上提意見。這次各方面提出的意見真不少。當時魏副院長對大家說：今天的會，開得很好，象這樣的會以後還可以多開，對於鋼院的發展一定是有好处的。請問一次過後，何以直到今天沒有見到再召開類似會議？那末，當時那種很漂亮的閉會詞是否由衷之言呢？或者會後有點胆虛了，所以來它一個“永不召開”。這件事，請日後回答一下。而這是你不走群眾路線的具體表示，同時說明了你是非常自負，自以為是。

(4°) 討論鋼院學則草案時，我們曾建議過：鋼院系初建，一切在草創中，應將院務會議的組織擴大，遇事大家來出主意，大家負責去做，才能办好。這是否黨的群眾路線的精神？你的答復是：各院校的學則都差不多，不能修改。一直有很久，我都沒有想不通：不從群眾中來，如何能使群眾有當家作主的感覺，因而發揮其積極性和創造性，是否學校之中用不着教師們有當家作主的思想呢？這種思想對學校和您魏副院長本人有啥不利呢？(我後來當然就明白過來了)。因為你有自私心。我們要求教授講助參與校政。

(5°) 1954年度全校工作計劃以“教學第一”為口號，号召一切工作圍繞教學。請問行政方面是否遵照施行了呢？您的回答可能還是那句老話(您和我在赴教室樓同路時說的)：他媽的，都是些外行，又不聽話。可是我們要問：誰在領導呢？為什麼不請大家和您同時想辦法？這說明你在“吹噓”，而不足實地去作。要求學校中應以教學第一，一切圍繞着教學，為教學服務。

(6°) 苏聯專家到校之後，几乎事無大小，都要請教專家，對中國教授們的意見，認為一無所取。只愛聽“專家的計劃周密詳盡恰當，專家的講課簡直是如同天衣無縫”一类贊美之詞，而對我們向專家所提的合理的問題，則當面加以斥責。為什麼同樣的言論和建議，由中國的教授們提出，則認為毫不足道，置之不理；而由蘇聯專家提出，便認為是金科玉律，必須立刻執行呢？是的，我曾經批評過這種觀點不正確，和往日的崇拜洋大人毫不一致。今日我還是這樣的看：必須獨立思考，親自去解決問題，不能“專”靠外人(包括任何的外國人)。就因為這樣一句話，在你所領導的肅反運動中，給我扣上大帽子一頂“反

蘇”，還說什麼“你對學習蘇聯沒信心，好好反省，好好檢查你思想的老根”。這頂帽子壓得我今日心中傷痕猶在，當日大會圍鬥的情況，記憶猶新。今天提出這件事，是為了听听群眾的公論，辨明是非。我深感魏副院長對“老馬識途”四字的深意認識不清，您雖在領導高等學校，而不知中國高級知識分子的特点，更不知辦高等學校的規律。

(7°) 蘇聯專家臨走之前，對您說什麼呢？“不能事無大小，都專靠蘇聯專家來說來作呀！您們自己也得親自動手呀！現在該中國專家們作啦，並且我們想听听中國專家的意見。”這些話也是你親自說出來的，請問這些話是什麼意思呢？我覺得蘇聯專家們這些話，的確够朋友味！是明明地告訴您說：人必須自己長心，自己站不起来，誰也沒辦法”。請問這些話和我的所說的話又有何不同，而你拿“反蘇”號的帽子來扣我們的理由，在那里？反對這種教條主義！

(8°) 有一次秋季開學，您要去致開學典禮的開會詞，我恰好從家里出來和您同路到會場上去，您說：每年開學都得說一套，說什麼都說得無可說了！開學時，覺得對學生無話可說，請問是否研究過全院學生各方面的情況？那末是否在盲目地辦學呢？也許那是您當時“過謙之詞”，是我誤會了。

(9°) 据我所聞(宋佩純說的)，現在本校當助教學生所提的意見，數以千計(二、三、四千條)，而您經常置之不理，不知院長的重要工作是什么？那末當然也就對學生無話可說了。反對盲目的辦學！

(10°) 可是，去年的總結匯報，却是洋洋萬言。十分之九以上，專說成績如何如何；只有最末一小段，提到偏差缺點是個別的，非常符合流行的普通公式——黨八股。很明顯，那個匯報是報喜不報憂，是粉飾太平，是矇蔽上級。如此滿足於現狀，而目光短淺。若内心別有企图，那就難怪要那樣地寫了，我們不能同意那種總結匯報。

(11°) 你的作風是：把上級的指示硬往下貫，遇事依靠蘇聯專家，而拒忠言于千里之外。只佈置工作而無檢查，僅聽若干個人的匯報而不接近群眾，不依靠群眾。在清華時期，你和蔣南翔校長不能合作，是有目共睹的據聞。您和前副院長杜若牧之間也有摩擦，也搞不團結。此外，等級觀念十分濃厚，就連學校開會發通知，也要寫明：……院、系、處、科、室等各首長以及各教研室主任等一律出席。教授講師等教學人員，被壓在“五指山”底，從來沒參加過學校重大會議。不是他們沒意見，而是“行政第一”，就連一個科長，(例如李石洋)都是威風凜凜，官架子十足，把教授們看作“教仆”。鋼鐵學院的“官味”重，學術氣氛不足，一堆外行把學校當作衙門，來此上任作官，以期榮華富貴，使自己的“下屬”也分食一點解放勝利的果食，沾點福氣。什麼教學工作和科學研究，簡直成了你們“循私”，“享樂”的幌子。魏副院長在清華大學內籌備時期，常自嘆“沒有作戰的陣地”。今天營地有了，請問您那一次，那一方面是您“光榮的戰役”？可是請問您浪費了積壓了人民血汗所生產出來的物資？

從這一系列的事實，以及最近所揭發出來的還微不足道的事件，可以說明：

魏副院長喜歡別人奉承，偏聽片面消息，不走群眾路線，作事不足踏實地。驕傲自滿兼自私。拒教授于千里，引魑魅為知己，自吹自擂，自己在那兒欣賞自己，“個人享受，作官自私，出人頭地”。

如是我聞我見(調寄西江月)。

舊房狹窄不堪，新舍寬敞齊整，四季鮮花開不斷，几鏡沙發舒適。

這應歸功於他，設計管理非易，他時常惦念着我，真是個好夥計。

這樣一點享受，實在不足掛齒，堪笑群眾沒見識，偏愛說三道四。

本職到任以來，開舍常見上司，往日漢馬功劳大，對我理當如此。

憶當年在某地，事事都很滿意，向知識分子學習，可真有點贊氣。

#### 二、張副院長的官僚主義

1954年8月底，從大連“基礎課教學大

綱討論會”會議回校後，我們向院方提出匯報，並着重說明：新教學大綱的實行，可能有許多困難，高教部特別指示，要我們提請院首長，要把會議精神，轉達全校週知，以預防學生負擔過重。張副院長當時聲明是代替魏副院長出席听取匯報的，一定轉達後者，並將設法引起全校教師特別重視。但是後來沒見到有什么佈置和措施。

後來學生們都叫起“學生負擔過重”啦，10月13日下午教務處才召開了一個臨時會議，討論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我在會上說：我們早請學校特別注意，以期主動地防患於未然。但是領導上“並未重視”，起碼是“重視不夠”。當時張副院長說：話不應該這樣提，院方早就“十分重視”。可是，到1955年4月高教部來鋼院檢查工作時，張副院長們的口氣却完全改變了，滿口都是什麼：過去不太注意，重視不夠。這種對上級一種說法，對下級又一種說法，請問那種說法是事實？

一張好嘴，兩副面孔，對上對下，態度不同，這是十足的“小官兒”的作風。由於當時我在會場上頂了張副院長那一句話，肅反中頂了大帽子一頂——反領導。說什麼存心要打擊領導的威信。“威信”是傾聽群眾意見，正確領導的自然成果，不是用媚上壓下的欺騙手段所能獲得的。

#### 三、傅君詔副教務長

(1°) 傅君詔同志是副教務長，負責領導公共教研組。54年秋褚一飛教授到校，教採礦系一年級的高等數學。不到兩月，同學們有意見，傅君詔同志轉告我說：“學生要求更換先生”我說：目前學校發展得快，教學人才缺乏，此風不可開，教研組本身人手不足，以不換先生為是。半年过后，傅君詔同志說：“學生一再請求，說聽不懂，數學教研組這半年工作比較少，人力調動得來，還是更換一下好”我說“褚一飛教授原來是搞統計的，很久不教數學，一時摸不着數學的勁兒，是很可能的。要求先生注意改進教學方法則可，但更換先生之風不可開”。傅君詔同志說：“是一百多個同學的時光重要呢，還是一位教師重要？”我說“教務長既然主張一定要更換，請您自己去和褚一飛教授談去好啦，我是一個主張要教師改善教學方法的，而反對更換教師”。這件事引起褚一飛教授在很長時期內的不滿，有時流於言詞，我借此機會想問傅君詔同志當時是和褚教授怎樣談的？

(2°) 傅君詔同志領導數學教研組，可是往往好幾個月見不到您的面，也沒有您到教研組檢查過工作。有一次談到檢查工作問題，您說：“有些事情，通過黨團員內部，我還是知道的”這話使我們很清楚的了解到：鋼院教學人員，有內外之分。

(3°) 我語言之間，的確諷刺傅君詔同志。為了討論工作量制，學校要我當公共教研組的召集人。開會討論時，傅君詔也到了(但事前我一點不知道他也要到會)。在致開會詞，我說：今天有“先知先覺”者到場，對我們的討論一定是有好处的，傅副教務長事前曾參與過院方的討論，我們對政策有不了解的地方，可以當面問問……我當時的心情是“既用我，是否信我呢？既賦以職，是否有權呢？”

所用“先知先覺”，四字的確是有意的諷刺。這四個構成了“我打擊領導威信”的組成部份。

(4°) 最令我莫明其妙的是：你對劉叔儀教授說：“象劉景芳那样的人，他還說他請求過入黨，真是笑話！”請問：什麼的人，才有資格說請求入黨呢？是的，在1927年春三月，我對我被國民黨抓去槍斃的學生要入黨，當入共產黨。以後，你們不論那一個，要看見我入了國民黨，可殺此頭。我雖以革命性不強，在1947年秋沒有和申伯純，王平等同志同赴延安(王平同志离北京時，曾到我家問我：走不走？)，可是我想：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公民，我“請求”入中國共產黨的資格总有吧？你身為黨員，你在給黨製造什麼空氣？這種話對黨在何利？劉叔儀教授倚在人間，我希望三方對面，談談這件事情。

其他如王總務長(黨委)的蛮橫粗暴，林楠(黨委，以前的黨總支書)同志從來不大和教授們接觸，只坐在黨部等人去“朝拜”，科長李石洋(黨員)的“無法無天”而黨委們却容忍放縱。在這種黨委治校，行政高於一切的氣氛下，教學人員在鋼院只能處於屬地位，所謂只能參加“施工”無權參與“設計”。因而人們的思想行動，就有了各種不同的表現。

(下轉第三版)

(上接第二版)

## 二、主宗官作風下人們的思想和行動

第一类是善于忖測領導意图，吹拍奉承，看风头行事者，非領導所喜者不說，以便取得“聖崇”作个亲信，好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是領導者心目中的积极分子，可是群众对这类人的看法和估价，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第二类可称为“明哲保守”者。他們对領導者无法相信，但因“无权”也只得默默不语，努力搞好自己的工作，以期无负于下一代。遇到和自己有关的事情，也发表意見，听不听在你。这在領導者心目中可能是中間分子，或者好好先生。可是他們並不是对領導者真沒意見，不說而已。

第三类是領導者心目中所認為的落后分子。这些人对于些客觀事物，不但有他們一定的見解，特別是对于一些不合理現象，勇于提出批評，直言不諱，易于招惹“主宗官”領導者的不滿，而碰得焦头爛額因而对主宗官領導者也有不滿情緒。我个人就属于这一类，被傅君詔同志斷定为“根本上沒資格請求入党的人”。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鋼院領導者这种“主宗官”作风，立刻影响了年青的党员。他們看着老輩党员如此，便錯誤地認為这种作风就是党的傳統的作风，因而就也去依样葫蘆。上級愛听單方汇报，又不深入群众檢查工作，有些知識不成熟的，認不清是非的青年，从中興風作波，乱报消息，甚而挑撥，打人悶棍，作为个人的“政治資本。”这种推論方式，从最近各方面所揭发出的情况看来，可以肯定的說，是正确的。

**肅反運動是“主宗官”作風突出的表現。**肅反運動一开始，魏景昌同志作动员报告时肯定的說鋼鐵學院中有反革命分子，学生中有国民党的少校，还有特务和土匪。还說：“不要搞亂了”的想法是有害的。“自由主义者是不会守秘密的，他們对党有不滿情緒”。在九月一日又作了关于坦白，檢举的报告，並肯定的說：“发现在我校的确有反革命分子”。……

“有些人提出共产党是騎在人头上的，这表示出其反动的本質”有的說：“以前崇美，現在崇苏，把苏联与帝国主义相提並論，提出之后不但說对客觀不滿，而发发牢騷，客觀是否象他想象的样子呢。

那兩次報告，真是說得淋瀝尽致，十分痛快。總結報告說成績是主要的，偏差錯誤是个別的。我要問：肅反結果，鋼院共有多少反革命分子？有几个特务？有几个土匪？請你把人名公佈出来，我們也好开开眼界。“自由主义者是不会守秘密的，他們对党有不滿情緒”。的确，自由主义是不会守秘密的。你說他們对“党”有不滿情緒。他們是对“某些党员”有不滿情緒呢？还是对“党”呢？对“某些党员”有不滿情緒，是否就算是对“党”有不滿情緒呢？只怕你是把“党”和“党员”混而为一了吧！

明明人們說的是“某些共产党員騎在人头上”，而你却把“員”字去掉，意义当然就不同了。說某些“共产党員”騎在人头上，这就算表示其“反动的本質”嗎？今天，党要大家“鳴”“放”，揭发出来：鋼院的确有“騎在人头上的共产党員，例如王慕林等难道这些人都具有“反动的本質”嗎？

“以前崇美，現在崇苏，把苏联与帝国主义相提並論……”这是你当面和我說的。

今天我还是那样說：同样言論和建議，由中国的教授們提出，則認為毫不足道，置之不理，而由苏联專家提出，便認為金科玉律的人，他的觀點是不正确，这样的人是思想懶漢，不开动自己的腦筋，不独立思考，不辨是非，他那种作法看法，和往日的盲目崇拜洋大人毫无二致。的确，对这种人有点不滿，而且发发牢騷，客觀现实的确就是这样，魏景昌就是这样的人。你講話的特点是把“党员”换成“党”，把客觀现实的“人”改成“客觀實現”，把小的夸大，以实行你形而上学的推理方式，还自以为是。这就是你爭辯的技巧和惯技。

在肅反运动中，有很多所謂資料，是东問这个，西問那个，临时乱湊的。軋57.2班部分同学給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信中所說的情况，你承認不承認那些事實？

據聞肅反中，全校教师学生被斗者四百多人。象你那种說法，那末他們都是反動的。我看鋼院的肅反运动，可以看成是“祖宗官”的領導者想把他們認為“不順眼”的人来个一扫光，或重重打击一頓，要他們永远不敢講話，以便更稳当的当“官”，实行封建統治，以便作威作福，行兇打人，而群众敢怒不敢言。並且還

是有領導的在那兒作的。給我戴了三頂帽子：反党，反苏，反領導。除我已經承認的那些話以外，請問你还有甚么資料，不妨都拿出来。而我所說的話，是否足以構成反党，反苏，反領導的罪名？我們不妨爭鳴一番。我說是有領導的要与我以罪名，这有党员（当时他还是党员）解基培可以證明。我被圍斗了三天。自問从1947年以来和党员有接触之后，对党忠心耿耿，到鋼院所得的政治待遇竟如此，十分痛心。我曾因此痛哭过三次，有一次解基培亲眼在前，他說：刘先生，你应当知道，一切是有领导的”但是我問杜維新，林楠，和你魏景昌，你們都不承認。大丈夫作事，应敢作敢当。說了不算，是无恥的小人。

我只被斗了三天，还不算太久的。对别的教授們呢？把刘叔仪教授斗了三个星期，傳君詔还亲自到他家加以威脅，他只得乱說一起。把孕妇一講师王美英斗得小产了，有沒有呢？在学生方面，象軋57.2班的情况，決不是个别的，而是相当普遍的情况。我还要問，共有多人跳楼而死，或跌断了多少腿？

## 肅反的結果

肅反的結果怎样？“主宗官”的領導者，当然十分滿意，認為以后可以为所欲为了，誰还敢說个“不”字呀！当然認為成績是主要的，偏差錯誤是个別的。我也要問究竟成績是主要的，还是偏差錯誤是主要的。

據我們所了解的，肅反以后，人們更加憤怒，但不敢言。教授們更是各自回家关门，老死不相往来。新老更談不上團結，人們对黨員則“敬鬼神而远之”，刘叔仪教授說过这样的话：自己无才无德，羞見我培养出来的黨員助教，把我莫明其妙的整了二十多天，整得我迷三倒四，把我還沒見天日的孩子，从她母亲肚子里就給整死，說我們是老狐狸，罰我爱人天天垂手站立。我再上課，如陷囚牢，如临大敌。我还想保留我这条中年还可有为的命，去作些科学研究工作，有貢獻于祖国和人民，使魏景昌、傅君詔、林楠之流，將來看看刘叔仪到底是个什么人？

其他的教授們，到今日还有不說話的，为什么？不敢說！比如就有人說“我們这种天生的受气包，还是別作声为是，下次被整，更利害十倍！今天的每一句話，也能都是日后的大辯子”。可是我們聽說，“迎会上意者”已荣幸地被吸收为黨員。这样来領導党，不是爱党，而是害党，会使尚未成熟的青年党员錯誤地認為这种“主宗官”的作风，就是共产党的基本作风，把它繼承下来，蔓延下去，那末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个大好的称号，將会离开馬列主义而变質。

我个人自恨心胸不够寬大，政治修养不够，認為肅反运动中对我的“圍攻”，是有計劃的有領導的，对我施行污辱。我被正式圍攻了三日，我承認素日发言的态度，語氣，聲音，全色可能全有問題，可能冒犯了許多“官”老爷的“威严”。當你們讓我反省的第一天，我就去和运动的領導者开始談判。魏景昌始終咬定“你講話的态度不好，应当講究”。是的，講究講話态度，是发言者自己的事，作为一个領導者，專要求別人講話講究态度，等于封閉人口，等于下令禁言，等于禁止批評。馬列主義者的魏副院長，請問你是与不是？

我也和党委林楠談过關於肅反的事，林楠說：“我們是可以和人算总账的”还說，“帽子大了，可以換个小的，不合适可以摘下来”我要問“党要我們經常实行批評与自我批評呢？还是教育我們和人算总账？”为什么公开打击人，暗地里偷偷地去给人賠不是？这种态度光明磊落嗎？你們的面子和威信何以要高人一等？这是誰給你們黨員的特权？还是是自封的？請解釋。

我真傻！我真傻！对这件事始終不能忘懷。最后悶得生了一場大病，疗养院住了四个半月，真是“活該”，誰叫我自己想不开！当我臥病的时间，我的学生到病牀前和我說：老師，我們需要你的教育，应当为我們活着，我的兒女对我說：爸爸，我們需要你的教養，应当为我們活着，我知道我还有对下一代的責任！可是，我真傻！我的健康那里去了！毛主席呀！您的政策是英明，您能明察人民內部的矛盾在那里——主宗官，要我們鳴放，吐吐人們心中的苦水和悶氣。

試試挖掘“主宗官”的根源。解放后，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鉴于旧知識分子，不懂馬列主义，有资产阶级思想，易于坏事，就是那点知識，也沒啥了不起，不与工农相结合，也都是些沒有用的东西。可是教育是为阶级服务的，是政治的工具。党須要教育，也需要科学，而党在这方面的人力不足，“一起拿过来自

己办”这是做不到的事。可是党对旧知識分子不相信，或不完全相信，于是一方面使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另一方面則把“黨員合計合計，看誰过去受过高等教育，或者有点功劳的，都放在高等学校里，去好好地完成人民的教育事业。再者，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經成功，对往日有汉馬的功劳的黨員也应当有所安排。在中共中央是以这些同志們革命多年，思想純洁，信任他們一定会很好的为人民服务，“有厚望焉”可是，有些黨員們便認為“天下是老子打的，胜利之后做官，也是份內的事。知識分子无出息，黨員万能，党就是我，我的就党，我的職責就是要改造知識分子，我是改造者，你們是被改造者。党虽然要消灭阶级，而“我們党”有等级，誰叫你是我的下級，我当然要命令你。你最好作我的亲信，当我的勤務員，我自然会提拔你。

出乎这些黨員們意料之外的是：中国的知識分子自有他們的风度：貧而不訛，可杀而不可辱，可作“友”而不甘为“奴”，何况“学府”之中，重才重德更重品格。我的知識固然有限，經過学习，久而久之，看你們那点馬列主义，也並不咋的，明明是滿口教条，却还自封为正的老牌馬列主义者。虽然是不應該的，对某些領導者也难免加以輕視，因为他們的言論措施，很顯明的是把中共中央的方針政策打了折扣，甚而背道而驰。因而就加以批評或背地里有所議論。

这时候，那些居功自傲，位于人上，不学无术亦又不求进步的黨員，便主觀錯誤地認為对他个人的不滿情緒，就是对党不满，說什么这种言論和批評便具有右反动本質。可是自己对于办高等学校是外行，而又想保持的“官”爵，保持个人的地位，因而对那些要提意見要批評的人，恨之入骨。我上次談話已經說過：这类黨員領導者似乎是在那兒这样想：

“咱們等級高，本領低，文化水平更難提，人家咋能服气。捧几个听话的和咱們一起，也好壯壯胆子。赶快培养咱們自己的人，是当前第一要緊的事。对那些要說話的要批評的，他們說話，咱們暗記，再看機會，等犯在我們手里，悶棍乱打一起，整他个一命嗚乎，倒也出口悶氣”。

你們可能認為這話說得过重了，但在鋼院过去的情况，就是这样，而且从最近所揭发出来的事件，便可証明这一点。

那末，我們可以說：产生“主宗官”的根源是一些黨員們的資產階級思想和封建統治思想的复活，他們雖然參加了多年共产党，自命已拋棄了原来的阶级，其实那些腐朽思想並无根除，因而一触即发。也許這是不自发的，但是又好象是自觉的。

### 我們的要求：

(1) 要求中共中央放棄党委治校政策和制度；

(2) 在學校中，黨政要分開，要注意學風，是学府而非官府；

(3) 把學校交給內行人來辦，黨員內行者可參加，但不應一黨包辦一切，命令一切，必須有真正的民主集中制的氣氛；

(4) 要求教授、講師參與校政。

### 目前要求：

(1) 整風應請黨外人士參加，了解黨員檢討的情況，向他們學習，提高自己。

(2) “主宗官”不能整“主宗官”，要求市委或党中央來校領導整風。

(3) 對肅反情況要群衆加以審查，重新估價。

(4) 特權班必須取消：無人願教，下學期無人來教時，恕不負責。

(5) 請公開回答所提出的一些問題。

## 聲討右派言論

壓力加工教研組 工會小組

我們小組在20号晚間和21号下午圍繞着毛主席的文章進行了热烈的討論。大家一致認識到这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次很好的教育过程，給了我們以分清敵我辨別是非的标准，这就便于去和右派分子以及我們的敌人进行斗争。

不击退右派的进攻就无法进行整风，我們要全力地打退这股整风中的逆流。全体与会同志对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言論表示极大的愤慨。如果按照儲安平、章伯鈞等人的說法去实践，必將使全国人民重陷于奴隶的地位，这是中国人民所决不允许的。

沒有党的领导就沒有社会主义的前途，就沒有人民的一切——这就是我們共同的認識。

## 從劉景芳教授的“哈哈鏡”談談劉教授的立場

院長辦公室 朱明德

劉景芳教授在教授座談会上的发言，有很多地方是似是而非，是非顛倒：把党的领导說成是封建統治；把党员形容為惡鬼邪神；把肅反運動說成是对“不順眼”的人來个一扫光；把向蘇聯專家學習看成是崇拜“洋大人”；把积极說成落后，把落后說成积极；把成績是主要的說成次要的，把缺点是个别的說成全面的。總之，把周圍的一切都歪曲了混淆了，人們不禁要問，身为高級知識分子而明察秋毫的劉教授，何以会得出这些离奇的怪論呢？其实这不足为怪。劉教授对周圍事物的觀察，总是帶着自己固有的“哈哈鏡”的，通过“哈哈鏡”把外貌的一切都变形走样了。

劉教授在其发言中，为了要說明自己獨創的所謂“主宗官集團”，煞費苦心的拚湊了許多例子。如說：“你（指魏付院長）在搞小圈子”，“你們等級觀念十分濃厚……教授、講師、助教被壓在‘七層樓’底”，“把教授們看作教父！”……。這些“莫須有”的例子，不知劉教授的“哈哈鏡”是怎样反映出来的。我們倒要請教，魏付院長究竟搞了些什麼小圈子。鋼院等級觀念十分濃厚，是否就是劉教授所說的“學校开会发个通知，也要写明……院、系、處、科、室等各首長以及各教研組主任等一律出席”。过去院長辦公室發开会通知，确实写过各处，室、系、科、教研組負責同志参加，难道这就是等級觀念十分濃厚嗎？仅从这一例子来看，也足以說明劉教授的“哈哈鏡”是如何的在歪曲事实。劉教授還誠惶誠恐的“要求公民人人平等，要求黨員放棄特權，莫做特殊阶层人物。”我們要勸告劉教授清醒一下自己的头脑，黨員並沒有什麼特權，更不是什麼特殊阶层人物，黨員並沒有騎在人民头上，而是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並且是全心全意的在为人民服务。鋼院也沒有什麼“等級”，更談不上有什么“等級觀念”。在人們之間，只有分工不同，並無等級之別，更不是劉教授所歪曲的鋼院是“一堆外行把學校當作‘衙門’來此上任作官”，而把“教授、講師

(上接第一版)

列寧主義的思想武裝，他們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而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就沒有别的利益。难道这种勤勤耿耿大公无私、积极工作的人民勤務員，就是劉教授所說的“搖旗呐喊”的嘍囉嗎？

我們認为中国共产党是为全国人民所爱戴的党。虽然党在各种工作中也可能犯某些或大或小的缺点和錯誤。但是党有力量来揭露这些缺点和錯誤，經過批評与自我批評加以改进。这正是党的偉大生命力的所在，必然永远为人民所信任和拥护！

## (四) 党能領導高等學校嗎？

关于這個問題，我們回忆一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有帮助的。当第一次党代會的时候，只有12个代表，經過艰难曲折的道路，付出了成千上万的党员及革命群众的生命的代价，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大敌人，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成为执政的党。难道这不說明党有“战无不胜，无攻不克”的偉大力量嗎！就拿解放后的情况來說吧，如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及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社会主义的建設，这一切工作，难道党一开始就是內行嗎？不是的，都是由外行变成內行。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党是馬列主義的党，在各項工作及斗争中始終充分地发动与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因而取得了无可辯駁的胜利！再拿高等教育來講吧。八年来培养了数万名毕业生，他們正在祖国的各个角落里艰苦地劳动着，我們的教学改革基本上剷除了資本主义教育的毒素，而確立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方針与基本制度；专业設置扩充了，教育內容充实了，学校数目增加了，如此种种，难道不是成績而是缺点？同时應該指出：党是有条件变成“內行”的。首先因为它是党，是工人阶级的党；其次，經過整风以后，党必將大大消除“三害”，改进作风；走群众路線，用全校师生員工特別是老教授的力量来办好学校；再次，絕大多数的老教授是爱国的，是拥护社会主义的，是真正“以学校的工作崗位为安身立命之處”的，所以他們必將發揮最大积极性来帮助党办好高等学校。

遺憾的是：我們知識淺薄，对于如何治校

等教學人員被压在“七層樓”底”。所謂“等級”和“等級觀念”，这完全是劉教授的“哈哈鏡”的歪曲，完全是劉教授的无中生有。

既然劉教授所拚湊的許多例子，都是无中生有，那么劉教授所說的“鋼院的主宗官集團是由魏景昌同志为首的领导干部們自觉形成的”胡言亂語，也就不攻自破了。从劉教授所舉的一些人名来看，魏景昌、張文奇、傅君詔、林楠、王慕林等，他們都是党委会的委員，不知劉教授所指的“主宗官集團”是否就是党委会。据我看來，鋼院只有一个党委会，並沒有什麼“主宗官集團”，但是在劉教授的腦子里却反映這一個“主宗官集團”。这还是劉教授的“哈哈鏡”在作怪吧！

通过以上的一些問題以及劉教授在整个發言中的說法，不難看出，劉教授对各種問題与我們持有不同的見解，这絕不是一个單純的思想認識問題，而是一个帶有根本性的立場問題。这里，也許有同志會感覺：“豎崎，这怎么能談得上立場問題”，实际上也有人責難把劉教授的发言和右派分子的言論拿來比較是太過份了。是不是立場問題呢？還是例舉一些事實來說明吧。如同样对一些人，我們認為是积极分子的，而劉教授却認為是落后分子；而我們認為是落后分子的，劉教授則認為是积极分子，这难道还不是立場問題嗎？我們認為肅反运动的成績是主要的，偏差錯誤是次要的，而且也是难免的，但劉教授的認識則相反，还提出質問“共有多少人跳樓而死或跌斷多少腿”，同时，对党员肆意污蔑，說肅反以后，人們對党员則“敬鬼神而遠之，这不是立場問題又是什么呢？劉教授要求把学校交給內行人來办，反对党委治校，取消党在高等学校的領導权，难道还能說这不是立場問題嗎？其他类似的例子还不勝枚举，我看劉教授无论自觉或不自觉，客觀上与我們站的是兩個立場，实际上已充当了右派分子的同路人。这种看法是否正确，同志們还可以展开討論。

難于提出更多意見，但是共产党的斗争历史使我們坚信，党是能够領導高等学校的！然而，更遺憾的是，被誉为“办学內行”的劉教授却堅決地否認了這一点。

于是人們又必然要問，党委制能領導学校嗎？党委制是否产生“三害”呢？在党委制的領導下，能消灭在黨內存在的“三害”嗎？讓我們來回答這個問題。

党委制是什么呢？中共中央1948年9月關於健全党委制的決定中写道：“党委制是保證集体領導，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一切問題均須交委員會討論，由到會委員充分发表意見，作出明确的决定，然后分別执行……还必須注意，集体領導与个人負責兩者不可偏廢”。难道象这样一个一切重大問題都經過集体討論，反对任何个人包办代替的集体領導倒会产生“三害”嗎？我們不能否認，集体的智慧是最大的智慧，只有集体的力量才能克服各种不正确的工作作风与方法。这难道不是一般人都知道的常識嗎？

于是人們要問產生“三害”的根源是什么呢？我們認為，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不是工人阶级的思想产物，而是资产阶级思想以及旧社会統治阶级思想作风残余影响所产生的。

于是人們又要問，为什么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內有“三害”存在呢？难道如某些人所分析的那样，它们是由党委制所产生的嗎？不！决不！党委制是不会产生三害的，首先應該肯定党委制是好的。我們都知道制度是有决定性的，但制度本身不是万能的。无论怎样好制度，都不能保证工作中不会犯严重的錯誤，因为有了正确的制度以后，主要的問題，就在于能否正确地运用这个制度，也就是在于是否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作风与工作作風，沒有这些，人們仍然可以在正确的制度下犯严重的錯誤。是的，我們認為高等教育的每項具体政策並不都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而且工作作风与思想方法方面也確實存在着“三害”的歪风。例如在学习苏联中也有些硬搬硬套的教条主义；某些报告計劃及某些专业設置沒有切合当前高等学校的客觀条件，及国家計劃需要，而有某些过大与盲目，在办好学校的問題上，忽視老教授作用，凡此种种，都是党的缺点与錯誤，但这只能說，主要是由于某些党员

领导干部犯有“三个主义”所致，而且是党委制的产物，目前我們都生活在资产阶级思想的包围与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中，离开旧社会还仅仅几年，旧的思想作风，一切旧的习惯势力，时时刻刻都在侵蝕着我們，因此它就不能不在党内有所反映，这样在党员思想中，有主观主义、宗派情緒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識就並不奇怪了！同时还必须指出，在客觀上，我們建国才八年，在如何办高等学校的問題上，沒有一套成功的經驗，而經驗只有通過長期的实践才能逐步积累，不可能一蹴而就。

由此可見，在主观上存在无产阶级思想，客觀上又經驗不足，才是产生“三害”的真正原因。

正因如此，党中央号召的这次整风运动通过批評与自我批评，思想上清除主观主义，宗派情緒，在工作方法上扩大民主生活走群众路線，以消除官僚主义，这样“三害”是可以大大減少，或者可以消除的，我們堅信，这个目的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 (五) 我們的必然結論

綜合上述，我們始終認為党是光荣、偉大正確的；党委制不是产生“三害”的根源；党能够变成办社会主义高等学校的“內行”，因此就必然要有党来領導高等学校，要党委治校，同时，必須指导劉教授把党說成“漆黑一团”；把党的領導說成是“封建家庭与官僚統治的合一体”，把党员领导干部說成是：“等級高，本領低，文化水平最爾提，人家咋能服气，捧几个听话的和咱一起，也得壯壯胆子”，把党员领导干部描繪得如此无能，从而企图取消党在高等学校的領導的目的，这是极为明显的。

以上就是我們的認識与見解。由於我們閱歷短淺，學識淺陋。但因为劉教授是位老教授，又自云：“在大革命时期即支持爱护我們的党”，在内心也會引起虔敬。实想不到劉教授有取消党領導高等学校，取消党委制的主張。故于又惊又疑之余，敢于冒昧提出以上見解与之辯駁。敬請三思，不吝賜教！並望全院师生員工同志加以指正！

**附記：**在对待整风的态度上，从劉教授的所有发言里，我們看不出“細雨点点入心田，和风习习吹滿地”，（見劉教授順口溜）見到的倒好象：“是非黑白任倒置，污蔑謾罵載連篇”而这是与整风精神背道而馳的！

## 知識份子和工人

健 談

即使在今天，还有某些知識份子走到工人面前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某些优越之感。可是，在这次反右派言論的斗争中，他們原形暴露、相形見拙了。

在這次反右派言論的斗争中，这些知識份子的“优越”表現，不須我在这里詳加介紹，一言以括之——他們辨明是非的能力不如工人那样敏锐，他們的立場不如工人那样鮮明，他們的斗争性不如工人那样坚强！

工人在報紙上發表的那些立場鮮明，觀察敏锐的“檄文”已是人所共睹的事实，不須我在这里一一贅述了，我只講兩個小的例子。

一个是，某校少數知識份子到京郊某厂矿作別有用心的宣傳，起初，工人由于不明真象，还洗耳恭听，后来发现他們嘴里所噴出的全是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鬼話，普遍激起了工人的憤怒，工人們想：“他們別是反革命吧？”于是就把這些知識份子們揪到公安局去了。

另一个是，北大“黑格尔恩格斯”學派，拟創办刊物——“廣場”，（廣場者，顧名思義即发表他們言論之場地也！）与城內某印刷厂工人議妥，代为刊印。起初，工人以为是帮助党整风的刊物，热情极高，后来当排到北大中文系“才子”張立勳、潘澤宜之“不朽”傑作：自荐为北大这次“民主”运动第一声号角之鼓動詩——“是时候了”时，发现問題不对，特別是看到該詩最后一句“剷除这阴暗的角落”（大意）时，更加不解，于是工人們就自任編輯，把这句改排成“打倒反革命份子”了。張潘“才子”总还幸运，虽有这种改动，但大作总算被排出来。到了后来，工人越排越觉得不象話，索性把前版全部毀掉，拒絕擔當這一“光榮”任務。

“廣場”虽筹办日久，人才济济，可是直到今天还没能和广大讀者見面。（指鉛印本）这不能不是一件“千古憾事”！